

温柳词中的女性“他者”身份研究

张晨帆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 999078

摘要：在强势男性力量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以柔顺低微的姿态依附于男子是封建时代女性文学的主流表达，这在温庭筠和柳永的女性词作中刻画得淋漓尽致。本文通过分析温庭筠和柳永词中对女性的物化、规训女性思想意识和为男性情感代言这三个方面，展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形象的深刻塑造，揭示了封建时代下女性“他者”的境遇。

关键词：他者；女性形象；温庭筠词；柳永词

前言

温庭筠与柳永，作为唐宋时期两位杰出的词人，皆以擅长描绘女性题材而著称。在他们的笔下，众多女性形象栩栩如生，不仅聚焦于她们外在的绝世容颜，还深刻揭示了她们内心的相思之痛，流露出温柳二人对古代女性坎坷命运的深切同情与深刻理解。这些形象的刻画手法细腻入微，艺术成就斐然，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这实际上是男权视角下将女性物化为审美对象，是男性主观地将女性置于“他者”地位的一种病态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时社会性别角色的局限与偏见。

一、物化的“他者”

在读温庭筠和柳永的女性词作时，我们感叹其深厚文学功底的同时，也会时常感觉词中的女性更像一件等待被挑选和评头论足的完美艺术品，并不像一个具有正常生命体格的人类。这是因为他们笔下的女性是男性审美的完全具象化，是“被男凝”的客体，是被完全被物化的“他者”。

温庭筠虽“做闺音”，然而其审美却是“男凝”视角下的审美，简言之，他所描绘女性美都是为男性服务的。温庭筠对女性美丽进行构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女子容颜、服饰与姿态的极致描摹。二是对女子闺阁装饰陈设的侧面烘托。前者旨在突出女性的娇柔妩媚和风情万种，给读者一种扑面而来的香艳诱人之感，如《花间集》中大量描写女性服饰的名词，如“石榴裙”、“凤凰

鞋”、“金雀钗”、“绣罗裙”等等，在这些词汇中，许多实则直接将女性服饰和女性划上等号，描写服饰实则在描写女子本身。^[1]而后者则不仅仅是描写室内陈设的奢靡与华美，更有甚者将极富挑逗意味的器物放进闺房中，暗示女子内心对于性的无限需求。如《归国遥》中“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菩萨蛮》中“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至于柳永笔下的女性形象则直接反映了宋代男性审美的转变。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时期，从内部看，文人政治与朝廷的安抚政策共同促成了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于外部而言，则面临着来自辽国、西夏等势力的威胁，国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在此情形下，整个社会的心理渐有内敛柔弱细腻的趋势。同时，宋代文人的思想深受儒、佛、道诸家思想交融的影响，从生活方式到精神追求均倾向于清雅脱俗，崇尚简约与自然之美。由于文人政治盛行，士大夫阶层的审美理想逐渐形成一种风尚，他们欣赏那些柔弱娇媚、楚楚动人、慵懒无力的温顺女性形象，这也引领了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调，进而促使了时代审美观念的变迁，^[2]而这一审美偏好在柳永的词作中得以鲜明体现，如“楚腰”之纤细、“泪脸”之哀婉以及“慵睡”等女性意象；又如浓妆艳抹的女性形象大幅减少，转而盛行起淡雅妆容的风尚。

这些词作乍看之下确乎是及富有美的想象与意境，然而深入琢磨后会看到其笔下的女性是处在被主体审视和打量的客体，是男性审美视角下物化的“他者”。而这种物化并非仅仅只是男性美丽的在词作中的具象化，而且隐含男权制度下对女性相貌、妆容和仪态的评判标准。刘慧英指出：这些从骨子里被男权意识所浸透的男人们，通过对女性欲望的种种讲述，大肆赞美的女性形

作者简介：张晨帆（2000.11—），女，汉族，福建漳州人，澳门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育。

象的塑造，告诉女性“什么才是男人喜欢的女性”、“什么才是男人眼中的女人味”，构建着一种男权文化的意识形态。同时这些词作中极致奢华的描写传达了男性对于金钱、美色和权力的无限欲望，也充分体现了他们沉迷于品鉴这样的价值资本。正如《菩萨蛮》所描绘：“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又似《定西番》所吟唱：“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此类镜前的凝视，无疑蕴含着得意的炫耀，透露出对“美”这一价值资本的深切满足，象征着它能作为交换男性庇护与青睐的筹码。由此，男女间主从分明的社会地位在审美维度上完成了“看”与“被看”的物化转换，而女性亦不自觉地接纳并深化了这一转变，最终导致她们深陷于“他者”的境地，难以自我解脱。

二、附属于男性的“他者”

温柳笔下的词还体现了女性附属于男性的“他者”身份。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词作对于女性的教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在部分词章中描绘了古代男子对女性的肆意轻率地玩弄或无情狠心地抛弃，塑造了一系列薄情郎君的形象；也将古代女性在遭受抛弃或失恋失意时的无尽痛苦与哀伤抒发极致，将女性的柔弱与无奈展现得深切而动人。如“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又如《满江红·万恨千愁》中的“衷肠牵系”、“残梦断”、“几度垂泪”、“成憔悴”可见女子痛苦之深，“孤馆”、“独自个”又能感受到女子的孤独寂寞。^[3]而《南歌子·懒拂鸳鸯枕》中这名女子因丈夫离家许久故而懒得拂去鸳鸯枕上的灰尘，更无心修补裂开的翡翠裙，也不再燃香熏烤点明，词中更是直接写道：“近来心更切，为思君。”我们可以明确体会到她所有愁苦的根源都来自于男性，她一切行为转变和情绪起伏都依附于男性，男性的缺席意味着女性快乐的中断或缺失。第二，女性在失去爱情后对贞洁表现出令人超乎理解的烈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实际有出入。就温庭筠的词作而言，其笔下女子的现实身份多为风雨飘零的晚唐时期于青楼卖艺卖身的歌妓。晚唐之际，政治腐朽，宦官擅权；地方藩镇各自为政，割据一方；朝中党争激烈，相互倾轧不息；加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曾经辉煌的大唐帝国已步入黄昏。为了满足朝廷运行的财政需求，唐朝统治者不得不提高农民的赋税额度。在生产力没有显著提升的前提下，百姓们的生活压力骤然提升，导致大量的平民破产沦为流民，白居易的《卖炭翁》中那位穷苦的卖炭老翁与其令人垂泪的处境不过是当时百姓生存现状的一

个小小的缩影，足以可见晚唐时期底层百姓生活在何种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而歌妓们本就社会地位低下，即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状况下，她们更加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或被仆役任意转赠和贩卖，或因青春消逝而被抛弃，或因境遇变迁而陷入生计无依的处境。即便曾风光无限，她们的最终归宿往往凄凉不堪。《乐府杂录》中曾记载：“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因而深受唐玄宗喜爱，但在安史之乱后，她流落至扬州，只能以卖艺为生，最终病逝在长安妓院中。即便是这样一位曾备受君王青睐的宫廷歌妓，其遭遇尚且如此悲惨，更可见当时歌妓群体的普遍困境。在此情形之下，她们整日为生计百般奔波，在饱受剥削和压迫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已十分艰难，又怎会日日沉浸于情爱而垂泪哀怨甚至殉情自尽呢？因此可以说这样的描述始终带有很大一部分夸张成分，或是出于艺术创作需要，亦或在一定程度上暗含词人们隐晦的期许。

即便如柳永切身同情青楼歌姬的遭遇，也试图真正站在女性视角描写她们的内心世界，然我们透过诗词表象不难发现：这些词作中的只有女性也仅有将爱当作生活的全部，深陷男女之情和相思之苦，这实际上暗含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4]凸显了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快乐原则：男人就是女人快乐的根据，也是封建制度下“男尊女卑”思想和“以夫为纲”的体现。不仅支配着女性的情感，更奴化了思想意识。

三、为男性代言的“他者”

温柳词作中的女性温庭筠注重描写女性客观的外在形象（相貌、妆容、服饰和身姿），对女性的外在有着极致香艳的刻画，同时倾及笔墨描绘女子居住处的布置。而柳永将目光主要聚焦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抒发。

比较二者的女性词作，我们可以感受到极大的不同。有“花间词开山鼻祖”之称的温庭筠对女子妆容和服饰都有着细致入微的描摹，^[5]《论温韦词》中曾写到：“以脂粉饰物来刻画人物外貌”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在他的词作中，女子身处奢靡华丽的宫宇楼阁，身着华美的服饰，面若桃花，女性的风情与娇媚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她们无一不为男女之情所困，深陷离别或相思的苦痛。可以说，温庭筠笔下的女子给人以依附于丈夫的固化形象，在“男凝”的视角下呈现一种固化的“他者”身份。如《菩萨蛮》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渡香腮雪”描写室内华美的陈列，女子娇媚的容颜；而后半段

的“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表达了女子对枕边人的寂寞思念之情，词作没有一句在说情却字字显情。而柳永则更擅长于以女性主观视角创作，在词作中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这是由于柳永常年生活社会底层，浪子生活使他与歌妓舞女们长期接触。他能够欣赏这些女性们身上的才情与美丽，对于她们渴望自由的愿望非常同情，如《惜春郎》中“属和新格多俊格，敢与我敌。”同时，他笔下的女子不再一味沉沦男女情爱无法自拔，而是多了几分反抗意识和抗争精神。如《定风波》中女子大胆表达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爱人不归的埋怨和痛恨同样一展无遗。

因此很多学者多认为，相较于温庭筠，柳永由于生活环境更能都理解民众心声，并试图以平等的视角理解这些女性的悲惨命运，因此他的女性词作也更加客观和正面。然而实际上，纵观温庭筠和柳永的人生经历和仕途境遇，我们不难看出二人本质上仍然是借女性“他者”身份为自己发声。

温庭筠，唐太宗时期宰相温彦博之裔孙，但至其父一代时早已家道中落，不复昔日的钟鸣鼎食。温庭筠本人极具才情，勤勉于研读古籍，精通诗词歌赋，同时温庭筠亦怀揣壮志雄心，渴望能凭借自身文才建功立业。然时至晚唐，社会环境愈发动荡不安，尽管他具备出众的文学才能，却在科举考试中屡遭挫折，未能及第，这难免滋生诸多愁绪。柳永，出身于北宋官宦世家，自幼便有功名用世之志。然柳永的仕途并不顺利，年轻时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这使他心灰意冷，转而一心投入诗词创作中。直到景祐元年，51岁的柳永才终于考中进士，开始了仕途生涯。尽管“大器晚成”，但柳永的仕途并不顺畅，他先后担任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监、泗州判官等职，最终以屯田员外郎致仕。

尽管温柳二人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却在仕途道路上经历着同样的挫折与不顺。这使他们将怀才不遇和有志难酬的深切哀怨寄予其中，借女子的情感遭遇暗指在官场上的起伏跌宕和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无奈，发泄内心深处对朝廷冷漠的不满和反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词作里处处流露的是对命运不公的无奈叹息和始终难以释怀的惆怅，更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而带来迷茫

愁苦的真实写照。如温庭筠的《南歌子》“为君憔悴尽，百花时。”看似描写女子深陷相思的苦痛直到春天也没有心情梳妆，实则暗指男子不被君王赏识和官场上始终不得志的苦闷与惆怅。亦如柳永《迷神阙》中的哀叹：愁绪满怀，更添对“年光晚”的忧虑；面对异乡凄凉景象，不禁生出“美人迟暮”的哀愁；然而“京城遥远，秦楼难至”自己被贬至偏远之地，长久以来未曾收到来自皇城的征召之音即“佳人无消息”。在这首词中，他将内心对于建功立业的热望转化为对佳人的深切思念，将长久以来未被起用的境遇隐喻为京城中佳讯全无的悲凉。

结语

综上所述，温柳词的女性身上，有着封建社会强行赋予女性的审美规训、思想教化和道德束缚，极致柔媚的容貌和华美的盛装艳服显现出她们在男凝视角下被物态化的特征，没有选择的情爱痴迷揭示出她们情感的病态化，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那都是因为她们是相对于主体的“他者”。她们的一切行为都指向男性，她们是男性所需要的一切，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这种“他者”的身份，揭示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无限束缚与压制，体现了女性在封建礼教之下畸形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 [1] 罗燕萍. 缺席的女性与女性的缺席——从性别批判视角看唐五代词[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01): 90-94.
- [2] 唐圭璋, 潘君昭. 论温韦词[C].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 词学研究论文集(1949-1979).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47-248.
- [3] 王伟伟. 男权文化下的女性书写——以宋词为例[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05): 132-135.
- [4] 薛青涛.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试论温词中的女性形象[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4, (02): 33-35.
- [5] 徐定辉, 王莉. 柳永词女性视角探微[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2): 95-99.